

颂扬与压抑:民族叙事遮蔽下的女性困境

——论徐訏小说《风萧萧》

张 培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徐訏的成名作《风萧萧》集“浪漫与现实”于一身,描写了上海在沦为“孤岛”时期的一场波涛暗涌的谍报之战。对小说中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以及作者在细节描写处的用笔聚散细作研究,可以发现遮蔽在宏大的民族叙事中的女性困境问题。这一方面关涉到作者的文学思想和性别话语的表述问题,另一方面又与男性想象、民族国家想象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很有必要从性别视域出发探究民族话语与男权话语是如何对女性困境进行遮蔽的,进而可以为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提出一些合理设想。

关键词:徐訏;《风萧萧》;民族叙事;女性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6-0076-06

女性人物在徐訏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鬼恋》中的美丽女鬼、《阿拉伯海的女神》中为爱殉情的巫女、《鸟语》中与鸟儿对话的痴女芸芊等。不同于这些作品中“鬼”“神”般的超脱女子,《风萧萧》中的女性人物不仅具有理想女性的浪漫气质,还有现世女人的人生无奈。对小说中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以及作者在细节描写处的用笔聚散细作研究,可以发现小说中被遮蔽的女性困境并挖掘其背后隐含的男性想象与民族国家想象是如何影响抗战中的女性的,这有利于从性别视阈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文化特征,从而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有所启示。

一、颂扬与压抑之间隐形的女性困境

《风萧萧》中主要塑造了白苹、梅瀛子、海伦这三位女性人物,三者虽风格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点——近乎完美的理想女性气质,堪称“女人神话”。徐訏对三位理想女性的塑造也采用了较为统一的手法。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将女性人物神圣化。徐訏在文本中借叙述者“我”的口直言:“女人给我的想象是很可笑的,有的像是一块奶油蛋糕,只是觉得在饥饿时需要点罢了;有的像是口香糖,在空闲无味,随口嚼嚼就是;有的像是一朵鲜花,我想着看她一眼,留恋片刻而已。”“也许我需要的是神,是一个宗教,可以让我崇拜,可以让我信仰。她美,她真,她善,她慈爱,她安详,她聪慧,她……”^[148]正是基于作者对“真善美”的企慕,他笔下的三位女性便都有被神化的迹象,她们美丽聪慧、气质脱俗,梅瀛子像

收稿日期:2016-06-30

作者简介:张培(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是“山林里飞出来的仙子”,白苹像是“湖里浮出来的仙子”,海伦是“月光下的水莲”。而在精神追求上,她们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如“圣女”一般“保持着身体的纯洁”,过着无性、无欲、无情的生活。虽然白苹、梅瀛子为了各自的任务分别以“舞女”和“交际花”的身份与众多日本军官往来,却总能“全身而退”,而海伦在堕落时期被日本军官侵犯也可以幸运地得人相助并“虎口脱险”。于感情而言,白苹和梅瀛子对“我”的“爱情”似真似假,更多地成了实现其政治任务的“幌子”,而海伦对“我”表达的爱也仅限于“精神之爱”,与肉体无关,在这里女性对男性的“爱”显得是那么超凡脱俗。其次,作者将女性人物作了类别化处理,三个女人,三种类型。白苹淡雅忧郁、正直仁义,既关心集体任务又顾及个人感受;梅瀛子明艳火辣,是个狂热的政治追求者,为集体而不顾个人;而海伦则是远离政治的热爱艺术的单纯少女。如此设计虽使女性形象变得丰富,但难免有预设之嫌。再者,徐訏对三位女性的塑造还采用了象征化的手法。他运用了多种“物”的想象来形容三位女子,例如用不同的花来比喻,白苹是“百合”,梅瀛子是“玫瑰”,海伦是“水莲”;再如用不同的“光”来比喻,白苹变成“星光”,梅瀛子成为“阳光”,海伦成了“灯光”;又如用不同的色彩来隐喻,银色代表白苹,红色代表梅瀛子,白色代表海伦。由“物”及“人”,通过将女人“物化”赋予了女性明显的象征意义,这更加剧了人物的理想性。通过上述手法,徐訏完成了对理想女性的塑造,让其笔下的女性升华为“女神”“超人”,实现了对“女人神话”的完美畅想。

然而,男性将女人神圣化的背后,却体现着深层的文化原因,即男权话语对女人的“他者”定位。“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 en soi(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ing)。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2]。男人是“女人神话”的设计者,在男权话语中,女人如泥土一般被捏造和塑型,她们令男人既渴望又恐惧,于是男人对其进行梦想和“偶像崇拜”,通过女人走向完美的过程来认可和实现自己,实质上就是通过“女人神话”来美化男性自我。显然,徐訏也受到了这一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影响。徐訏在《风萧萧》中运用大量笔墨写男主人公“我”加入间谍组织的经历以及心路历程,文本中随处可见“我”面对国家衰败景象的哀愁和作出抉择时的挣扎与痛苦,从中可见徐訏是极擅长对细节和心理描写的。然而,对于同为故事主要人物的女性来说,作者对其细节及心理的着墨可谓少之又少。事实上,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相较于男主人公“我”来说,现实处境更加险恶复杂,其心理活动必然会更加丰富和纠结。白苹和梅瀛子分别以“舞女”“交际花”的身份周旋于日本人之中来窃取情报,然而对于周旋背后的故事以及女性的内心世界,作者似乎避而不谈甚至有意美化。小说中写到,“我从海伦的遭遇,从山尾忘机的赌兴上,悟到了白苹之所以为白苹,之所以在许多兽性的人群中开着不谢的花,之所以让一切接近她的人都只在她周围飞绕——像飞虫围在电灯泡外面,像群蜂围在被罩着的花朵”^[1185]。白苹“像玩虎者一样,让老虎力量在各种的刺激上消耗,使它再无余力吃人,到最后以为玩虎者是在可吃的人外的超人了”^[1185]。可见,女性在作者的想象中是神圣而纯洁的。然而,这样的想象却显得自欺欺人,因为尽管白苹和梅瀛子机敏聪慧,可凭借“姿色”打入敌人内部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靠“女性身体”作为救国“武器”便无可避免,而不被虎伤的“玩虎者”们只能是徐訏编织的美丽“谎言”。关于女性身体是否被异族侵犯,小说中可谓疑点重重,譬如对白苹与梅瀛子如何与日本人交际,白苹如何两次从日本军官手里取得密件都语焉不详。而“我”与白苹的偶然对话似乎也暗示了这个隐蔽的事实,“我”夸赞白苹是“不属于人的玫瑰”,而白苹却自言“是属于任何男子的茶花”^[1190]。显然,作者并非不擅长对女性周旋于“野兽”之间的细节及心理描写,而是在有意进行遮蔽。

正是在对理想女性的颂扬与压抑之间蕴藏着被隐形的女性困境。作者对女性真实处境以及内心世界的失语,恰恰反映出女性深陷于身体和身份的双重困境之中。“战争的逻辑是破坏你的敌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的,还有文化的和身体上的。这意味着要破坏人们的身份认同,即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加以破坏”^[9]。如此,“女性身体”在战争中就变成了一个意义场所,侵犯被侵略国的女人就不只是生理上的宣泄,而是对一个国家与民族尊严的侮辱。贞洁的丧失,尤其是丧失于异族

敌人,那就是对本族男性乃至民族尊严的高度打击,是不被允许和接纳的,因此“女性”身体在民族利益与道德的双重标准下便陷入了尴尬境地。女性身体的尴尬直接导致了其身份的尴尬。当“血肉的真实女人”以“圣女”“超人”的改造形象而存在时,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了被动的“他者”并以被赋予了神圣感、责任感的“他者”身份来实现权力话语对“女子救国”的呼求。民族危难之际,国家调动一切力量参与抗战,女性也被赋予“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的男性气概,她们响应号召,怀着对民族强烈的认同感超越性别、忽视个体,将个体融入民族国家的主体之中。然而,对于作为抗战一员的女性而言,却并不被当作与男性“同等的战力资源”来对待。尽管白苹、梅瀛子这样的女人很优秀,但她们的战场只能是自己的身体,而且当其被贴上“和男人一样”“超人”之类的标签时,女性作为性别个体参与抗战的主体身份便受到了动摇。正如白苹等人的身份认同在“我”的一句怨言中遭到了质疑和拷问:“总之,日本人走进你的房间,同他们军队走进我们的国土一样的使我不快。”^[17]因此,在徐訏的《风萧萧》中,以身体为代价的抗战女性实际上被悬置在了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之中,她们在情感、道德与国家的抉择中失衡并丧失了性别自我与主体自我。

二、女性困境原因探寻

女性困境被宏大的民族抗战叙事遮蔽,关涉到作者的性别表述问题。性别表述指文化本文对男性、女性的性别象征意义(性别符码)的编述和解读^[4]。也就是说,性别表述关注的是关于性别的话语而不是性别本身。创作者本就会因自身性别差异在文本中对性别的叙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涉及具体的性别话语则更是千差万别。由于叙事策略的原因,《风萧萧》中以男性主人公“我”为核心组织叙事,从“我”的视角出发看身边的女性,显然叙述视角的定位并不是客观的,以男性视角看女性,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盲区,那么忽视女性的特殊处境和细腻的情感体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与同时期女性作家丁玲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这一抗战女性形象相比,徐訏塑造的女性人物因“太过理想化”而缺少了“血肉”和“活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男主人公生活经历和心路发展的陪衬道具,从而也造成了女性困境的被忽视和遮蔽,这不得不说是其小说人物创作上的一个缺失。

小说在叙事上脱离真实的女性生存境遇与徐訏秉承的文学思想也有着密切联系。徐訏是一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作家,他反对文学成为革命斗争、统战和宣传的工具,这一点在其作品中就表现为以个性化的浪漫话语与虚构的故事来表达人生的诗意与哲学的主题。但这并不表示徐訏完全不关心政治,实际上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风萧萧》集“现实与浪漫”于一体,小说中写到的太平洋战争与上海沦陷时的各种景象都与当时的社会相吻合,因而具有现实的一面;而在关于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构设方面,想象的成分居多,浪漫的色彩又相当明显。正如徐訏自己在后记中所言:“我想我或许可能将生活中经验中的一些思想与情感在书中人物里出现,但实际上,在我的写作过程里,似乎只有完全不想见到过的或听到过的实在人物,我书中的人物方才可以在我的脑中出现……”^[1434]只是,浪漫的想象更多地赋予到了女性人物身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有大量面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心灵挣扎,而女性人物却在心理世界中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她们被塑造成为只有理想信念而毫无现实伤痛感的“超人”,象征着三种不同的精神意志高蹈在救国的“神坛”。现实的影子投射在男性人物身上,而浪漫的想象则主要架构到女性人物这里,两者“一实一虚”“一主一辅”,这鲜明的对比与徐訏在创作中对性别话语的表述差异相呼应,从而共同将女性湮没在困境之中。

上述原因只是造成女性困境被遮蔽的表层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风萧萧》中所表现出的男性想象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合谋”。一直以来,男性心目中向往的女性都是“白雪公主”“睡美人”等此类的美丽女神,而男性则常被描述为“救美”的“英雄”。徐訏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塑造美丽圣洁的女性形象并展现“绅士”般的男子美德,正是符合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男性想象。然而,当面临危难需要这些

“女神”们献祭时,徐訏对女性的完美想象就只能“屈从”于民族国家叙事并与之合作。虽然徐訏反对为集体而牺牲个人,也抗拒女人被作为“武器”为民族大义献祭,但其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他还是让自己笔下的女性在行动上为民族大义表现出了支持。例如,梅瀛子提醒“我”在许多沦陷地方的中国少女们遭遇着强暴,“战斗永远是以部分的牺牲换取整个的胜利,以暂时的牺牲换取最后的胜利”^[218]，“我”对之沉默许久,表示出了无奈的默认态度。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都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9]。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确当,本文所要申述的则是,徐訏的《风萧萧》恰恰充分体现出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巨大效力。坚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我”可以为了“民族意味”放弃自我立场,选择去做间谍,白苹、梅瀛子也可以牺牲色相和肉体去换取民族的胜利。可见,《风萧萧》中的抗战叙事对女性的想象是除了让她们在家庭上做“贤妻良母”外,还要其做“女中豪杰”,和男子一样介入到“救国运动”的民族事务中。然而,由于女性的性别特性被看作是弱质和异质的,因此女性抗战的前提是被改造为“他者”,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有胆识”“有谋略”,甚至超越男人幻化为“超人”,总之,女性只有被“他性”化的性别编码后才具有投入战争的合法性。民族国家的想象又需要女性作为一种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出现在需要她的任何场合。于是徐訏笔下的白苹、梅瀛子,都要利用自己的“身体之便”获取情报。但是“利用女性身体”的手段难免使“救国”的正义陷入尴尬,因此她们又被以“舞女”(白苹)、“交际花”(梅瀛子)等身份进行再一次编码,从而淡化了“良家女子”被侮辱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但以姿色救国的“女杰”们即使对民族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之牺牲巨大,也无法免除“贞洁受辱”的罪名,因为“被异族侮辱的身体”象征着对本民族的精神入侵,既污染了民族的“纯洁性”“庄严性”,又损害了传统的妇女贞烈道德观。于是,女性的结局只能是灰暗的死亡或者变相消失,“因为江山社稷是英雄们的,美人们可以为它服务甚至献出自己的姿色和生命,但不能真正参与,更不能分享这一切……又因为她们与敌方男人肉体上的关系,她们实质上被视为不洁之物,因此在大功告成之后她们除了消失别无他途”^[6]。所以,在宏大的民族话语之下,女性的性别身份与政治身份经过被不断地编码后只能被利用,却没有主体资格,陷入无奈与尴尬的困境便成为了必然。

三、看见真实的女人与建构女性主体身份

徐訏创造的“超人女性”与其说是对女性的颂扬,倒不如说是对真实女人的压抑。他放不下自己的“梦想”以及男性乃至民族的尊严,所以采取了将真实的女性掩藏的“鸵鸟做法”。而“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7]。撇开作家自身的性别差异,而单从其表述的性别话语中去看真实女人的“隐藏与呈现”,可以发现无论“真实的女人”被“隐藏”还是“呈现”,一旦被需要,她们的身份就要被“编码”后进行置换,才能赢得进入历史的权利,成为“历史的主体”。纵观历史发展进程,从晚清以来的“兴办女学”到五四启蒙语境下的“妇女解放”,可以看到“关于性别的现代性话语的立根之基是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话语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契机,但是女性作为性别主体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独立与自主并没有进入这一话语的视野”^[1920]。这一话语将女性的家庭职责推衍到“为国为族”的社会职责,却未曾要求“主外”的男性与女性共同分担“主内”的家庭事务,这种分工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实际上变相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目的论要求下的“新妇德”。正如刘禾提到的,“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到男性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宰制的权力而战”,而女人

“并未自动地共享着那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感”^[1]。因此,女人们即使在战争中“身兼数职”,也不能真正从性别的意义上获得民族国家主体的身份,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以主体的角色融入进了历史,也只是止于有限的且利于民族国家的空间之内,实质上处在了一种被悬置的虚空状态。因此,我们有必要打破男权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合谋”下的迷障,从中看见战争中真实的女人,发现她们在历史中最自然和真实的一面,从而为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

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是一项纷繁而复杂的艰巨任务,而归根结底便是要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发展二者的关系,继而为女性的主体建构奠定基础。“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2]。对于战争年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对话者”除了男性还有民族国家,在此对话关系中,男权话语和具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民族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女性则明显属于被规训、被管控的一方。虽然借由民族国家话语,女人得以在战争中展示自己,但她们的活动空间、权利与价值,仅属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部分。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女人在个人与历史之间根本没有自由的空隙,权力话语对女人的见识只限于其社会性和超越性而忽略了其自然性,这种情况下的女性主体身份不具有实际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建构起来。因此,女性主体的建构需要“对话者”以平等的性别表述为起点与平衡点,给予女性公正的定位和评价,而不是沉溺于某种想象和偏见,将真实的女人架空为缺少血肉和本质的人,最终酿成对女人尊严与价值的忽视和践踏。

毋庸置疑,“男人和女人当然是不同的,但他(她)们并不像昼夜、天地、阴阳、生死那么不同”,而且“男女之间不存在‘自然’对立,把男女看成是两个独特类别的观念一定是出于非自然的原因”^[2]。这种非自然的原因与长久以来的文化塑造和社会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可见,生理性别的差异本身并不导致必然的不平等,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是社会性别的区分以及其赋予两性不同的文化象征意义。所以,女性的主体建构需要打破社会性别文化偏见,不再以文化观念来绑架和施压于“女性身体”,也不再置换女性的性别身份与政治身份,真正理解和尊重女性的社会价值和生命本体价值,让民族的战斗和胜利属于“真实的女人”,而不再是归属于被改造了的“超人”“女神”或者“男女人”。就女人自身而言,女人要在肩负起“救国大任”的同时,亦要展开“自救”,对自己个体的生理与心理以及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敢于勇敢地表达和追求自我的真实诉求并反抗一切不平等的歧视与待遇,使女性自己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男权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中建构起真正的主体位置并从中实现个体的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总之,实现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究和努力。

四、结语

徐訏塑造的“理想女性”固然浪漫,但处于完全想象中的浪漫人物难免显得虚假,殊不知“血色浪漫”中无奈、挣扎又坚定的真实女人未必就不浪漫,她们反而在浪漫的色彩中又让历史更添了一些立体的真实感与厚重感。性别表述、文学思想、男性想象与民族国家想象,这些因素的合力共同将历史中“真实的女人”遮蔽在了宏大的民族叙事中,进而使得女性的主体位置被悬置。女性个体在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性别身份与政治身份被编码和置换,她们怀着对民族国家的满腔热血“赴难捐躯”,最终却要在传统文化的偏见中忍受“不洁之物”的罪名而被抛弃和放逐,消失在神圣的“救国大义”中,陷入身体与身份的双重尴尬困境。然而,真实的女性不应被遮蔽和抛弃,她们需要被正视并找到自我的性别角色认同以及政治身份的认同,在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建构女性的主体位置,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

参考文献:

- [1]徐 訏.风萧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波伏娃.第二性(I)[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66.

- [3]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M].刘 泓,黄海慧,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76.
- [4]王 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
- [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7.
- [6]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156-179.
- [7]孟 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3.
- [8]刘 禾.跨语际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02:285.
- [9]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 震,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50.
- [10]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M]//王 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42-43.

Praise and Depression: The Women's Plight Covered by National Narrative

—On Xu Xu's Novel *Fengxiaoxiao*

Zhang P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Fengxiaoxiao* is the famous work of Xu Xu's novels, which describes a stormy spy war in isolated Shanghai. Research on the three female image and the detail description, we can find the women's plight that covered by national narrative. On one hand, this issu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literature though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gender discourse of the writer.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great connection with the imagination of men and nation-st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national discourse and patriarchal discourse on how to cover the women's predicament, and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assump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 identity.

Key words: Xu Xu; *Fengxiaoxiao*; national narrative; women's plight

(责任编辑 王 作)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以及其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